

张作霖在东北

〔英〕加文·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作霖在东北

〔英〕加文·麦柯马克著

毕万闻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2 031 8451 6



ZHANG ZUO LIN ZAI DONG BEI

张作霖在东北

责任编辑：宋一夫

封面设计：姜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6插页 251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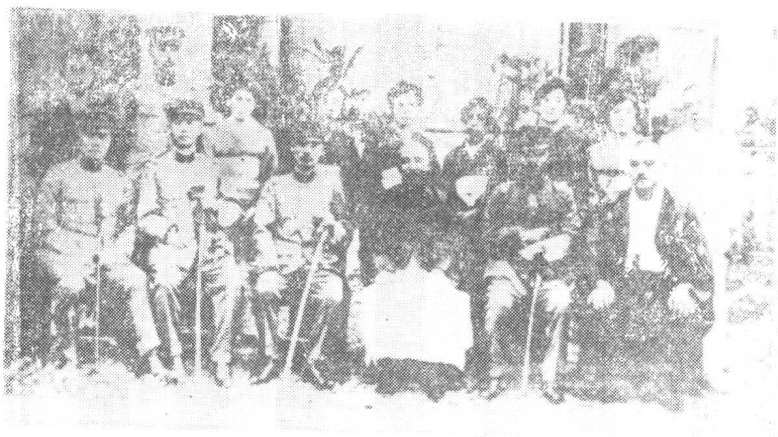
印数：1—6 075册

定价：2.8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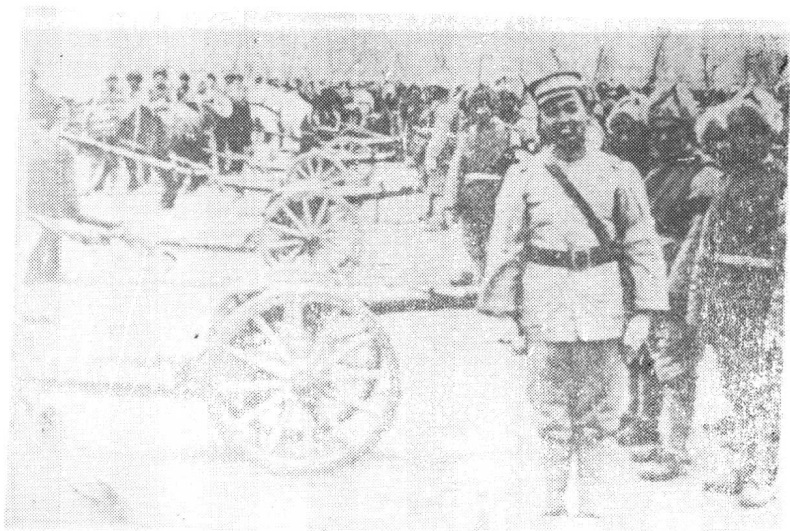
ISBN7-80528-020-7/K·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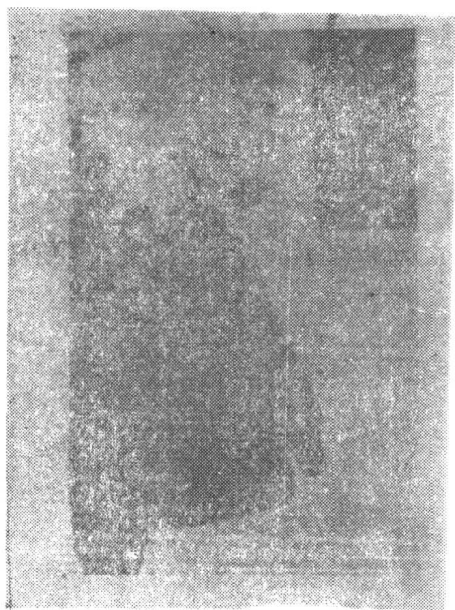
(一) 一九二四年天津会议，左起：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后站者为吴光新。



(二) 张作霖与日本顾问及夫人（估计摄于一九二四年年中）。前排右起：町野武马、贵志弥治郎、张作霖、本庄繁。



(三) 奉军部分炮兵（一九二四年冬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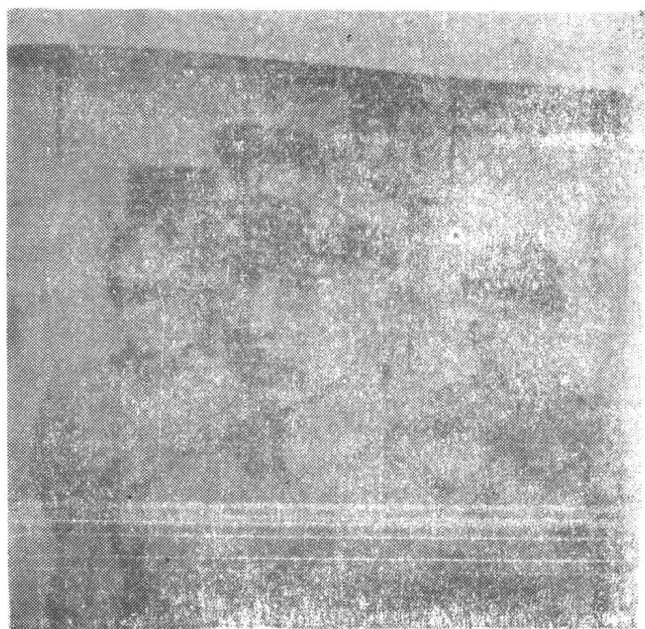


(四) 张作霖便装照两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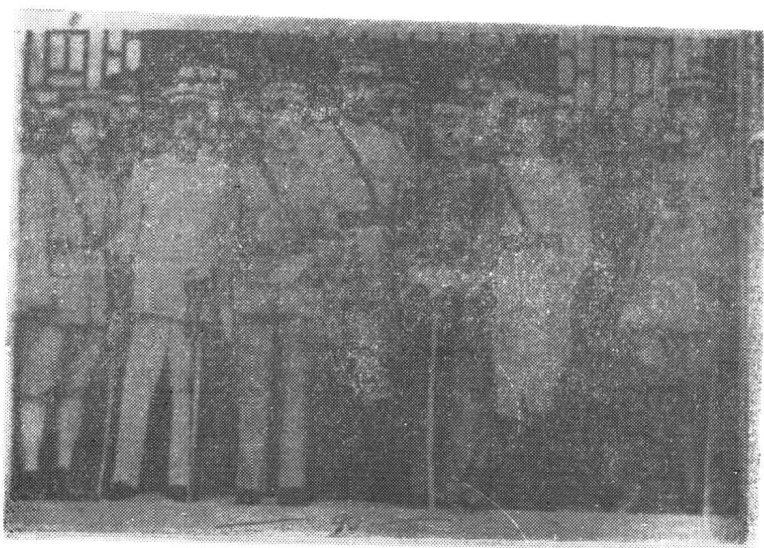
(五) 张学良视察奉天空军（大约一九二四年九月）。

(六) 张作霖（一九二五年），右后为杨宇霆，张作霖死后为张学良所杀。





(七) 张作霖(左) 与吴佩孚合影。



(八) 张作霖(左三) 张学良(左六) 父子与吴佩孚(左五) 及张宗昌(左四) 等合影。

60761/03

译者前言

曾经为人类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到了近代（1840—1949年），却经历了数千年来从未曾有过的两次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由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引发，首先由东北开始的，也以东北较为严重。“瓜分豆剖，触目惊心。”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是由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引发的，仍然先从东北开始，以东北最为严重。国土沦亡，生灵涂炭。在这两次民族危机期间，统治东北最久的人物，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

多年来，国外学术界对张作霖及其统治东北的历史的研究，颇为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大多是日本、苏联学者的著作。这使一些同志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西方学者对这一重大课题没有什么研究。为了多少填补这一空白，消除这种误解，经东北师大历史系赵矢元教授的推荐，译者翻译了这部著作。

本书是用西方语言写的第一部关于张作霖生平的学术专著。就译者所知，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作者加文·麦柯马克，为英籍澳大利亚人，是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除了母语英文之外，他还精通日文，也能阅读中文。作者研读了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有关这一课题的大量原始档案和论著（书中引用者约三百种）。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抓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奉系军阀的腐败这两个要害问题，围绕着张作霖的一生，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东北的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了自成体系

的论述，使这部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东北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著作之一。由于作者治学态度严谨，并尽可能做到言必有据，使读者感到他所叙述的基本史实以及由此而得出的若干基本结论是比较客观的，这就扩大了本书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当然，勿庸讳言，作者的某些论点未必正确，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时认真加以鉴别。

本书虽然名为《张作霖在东北》，但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与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党的北伐军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屡屡发生的战争，也作了较多的阐述。因此，本书不仅对了解和研究东北地方史、中日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了解和研究北洋军阀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也有参考价值。

中国的面积，二十五六倍于日本；在二十年代，中国的人口七八倍于日本。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野蛮统治中国东北达十四年之久。现在，中华民族早已重新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被人欺凌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败之后，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许多德国人不甘失败的心理，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当邻国仍然有人为过去侵华战争的失败时而行跪礼、时而唱挽歌的时候，忙于“四化”建设而又真诚渴望和平的中国人，特别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亡国奴生活的中国青年，抽空读一读《张作霖在东北》这本书，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东北，对正确地认识历史，深刻地理解现实，热情地迎接未来，是大有益处的。

本书是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英文版(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年)译出的。原书正文前有“鸣谢”两页，正文后有索引表，为节省篇幅，中文译本均删去了。原书中的照片，翻拍后，因有的不清晰，

译者换了几幅。原书引用日本外务省往来函电之处很多，但作者一般只注明发函（电）者的姓名和日期，译者只好照原样译出，好在这些外务省的档案都附有编号。书中的三幅地图，系原书地图（只是图上文字译成了中文）。以上，特此说明。

在翻译日本名称时，承蒙翻译家董国良老师和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郭洪茂等同志指教；在誉清译稿过程中，那丽同志也付出了大量劳动；三幅地图是请毕万方同志复制的。对此，译者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自知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切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导 论

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是个文盲，个子矮小，外表文弱，留着八字胡。在吸食鸦片和彻夜赌博的间隙里，他常常梦想着当上中国的皇帝。与许多可能也有过这个梦想的其他人不同，张接近于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在称为军阀的那群怪人中，他或许是最大的一个。就这点而论，他深深地卷入了民国早期的军事史和政治史。同时，他的权势以中国辽阔的东北地区为基地。这个地区被与它相邻的日本和俄国称为“满洲”。于是，他又无法摆脱地陷入了中日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而在他死后十年，这个矛盾把两国、并且最后把整个亚洲拖入了战争。因此，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过去却几乎没有对他做过什么研究^①。因而本书在按照年代顺序构筑张作霖生平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民国时期军阀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两个重要主题上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借此可能深化我们对当今中国工业化重要中心之一——东北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解。

问题无疑是错综复杂的，有关的学术文献又很缺乏，因此，有些论断是尝试性的。我们希望，至少这将有助于对这些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下面的引导性阐述意在确定背景和主角，并把注意力吸引到在考虑这些主要论题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争端上。

^① 作者是在十多年前写这番话的，当时确是如此——译者注。

背景：中国东北还是“满洲”

山海关镇，位于北京东北大约二百五十英里铁路旁边，处于通到北部渤海的长城线上，是通常进入中国人称为东三省或简称东北的关隘。辽宁（旧称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合计，约略与法、德两国的面积相等。

在历史上，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三个种族文化群体，他们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他们相互冲突的结果构成的。南部的辽河流域的农业平原，很早就定居着汉族人，他们从陆路经过山海关与华北其他地区和从海路越过渤海湾与山东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东部和东南部，是以渔猎为生的通古斯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生活在森林中和鸭绿江、图们江和乌苏里江沿岸（该三江现在仍然划分着中国与朝鲜及苏联的国际边界）；西部和西北部的平原和草原是居无定所的游牧的蒙古族人的家乡^①。

在这三个民族之间；在整个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当一个或另一个民族能够称霸的时候，就出现了持续不断地紧张不安和相互影响。因此，几个重要的中国王朝——辽、金、元，就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一样，大致都是以这个地区为基地而崛起的。不过，与此同时，汉族文化的影响却持续不断地向北扩散。来自北方的征服种族自身却迟早都屈从于汉族文化的魅力之下。在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在现在辽宁、吉林两省东部地区的通古斯族，当时称做女真，从行政管理上分为三个部族，其中之一叫建州女真。这样的周期性历史模式重复着，渐渐地，建州女真开始处于支配地

① 江上波夫：《北亚史》（日文），东京1956年版，第3编《满族》，第183页及其后诸页；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英文），马萨诸塞州，剑桥，1970年版，第3—8页。

位^①。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女真部族统一了。一六一六年，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称帝；一六二一年，攻占了明朝行政重镇沈阳和辽阳。努尔哈赤死后，其子阿巴海，一六四四年成功地把这个新的王朝（清）的首都迁到了北京，并统治了整个中国^②。

只是到了一六三五年，阿巴海才正式采用了“满洲”这个名字^③。它在藏语中的原意是“东方的光明”，最初是蒙古喇嘛对努尔哈赤的儿子们的一种尊称^④。按照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的说法，在阿巴海统治下，“满洲”一词渐渐作为一个群体名词，用来称呼女真部族以及承认努尔哈赤领导地位的蒙古人和汉族居民。因此，它并没有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同种同文化的民族或人种，况且，这是清朝快要占领北京时，才正式宣布使用的，那时，满族已经学到了“汉人关于统治、道德和教育的所有办法”^⑤。

阿巴海正式采用“满洲”这个词之后，“满族”这个词，在硬说它与中国有别之处，逐渐地被使用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用于乾隆皇帝钦定的一部十八世纪著作的标题——《满族源流考》，这部著作是以宣称其历史与文明可以与汉族相媲美的方式，来确立其非汉族统治王朝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尝试^⑥。满族延缓其被完全同化的一系列尝试与在中国确立其权势和特权的合法基础的用意，是众所周知的^⑦。而且，即使在创建清朝期间，在东北地区、在他们的故乡，汉族人在数量上也大大超

① 至少从唐朝起，建州就是行政管理上的名称，用来称呼奉天省的部分地区。

② 《北亚史》，第218—229页；《清史中的满洲边疆》，第7—8页，李琪（音译）：《历史上的满洲》，《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第16卷，第2期（1932年），第227页、第253—255页。

③ 《清史中的满洲边疆》，第7页。

④ 《历史上的满洲》，第228页。

⑤ 《历史上的满洲》，第227页。

⑥ 东亚经济调查局编：《满洲年鉴》（日文），东京1932年版，第34页。

⑦ 其例证，见《清史中的满洲边疆》，第8—9、20—23、182—184页。

过努尔哈赤的部众，也许多至二比一^①。有一段时间，满族人鼓励汉族人移入东北。但在十八世纪初，作为同样是为了维持满族独占性统治的部分努力，他们转而下达了封禁令。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最初是由于财政原因，他们再次开放大片土地，向汉人出售。法国旅行者古伯察，于一八四四——一八四六年来该地区游访，他写道：“现在，你可以穿过满洲到达阿穆尔河^②，但根本不可能不认为你是正在中国的一个省里旅行”^③。后来，由于阿穆尔河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的割让，使移民开发东北，以免东北完全落入俄国之手的重要性加强了，于是，强而有力的战略考虑也开始发挥作用了。对汉人移入的限制，渐渐地逐地区地放弃了，到一九〇四年，最后一个地区解除了封禁^④。本世纪初，当清朝快要结束之时，在大约一千四百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汉族人^⑤。满族到那时仍然是个人数很少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构成了重要而易于辨认的群体，继续把他们称为满族是很恰当的。

然而，确切地说，由于同化、通婚和汉化，满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在丧失其重要性，实际上，正在消失的时候，“满洲”这个词却开始变得重要了，由于与外国的单独联系增多，它成为十九世纪俄、日帝国主义实现其野心的一个方便的媒介。正如罗伯特·H·G·李在他的《清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中所说的：“满洲这个词产生于近代，主要为西方人和日本

① 康图·C·森：《二十世纪前半叶满洲的经济发展》（英文），哈佛《东亚评论》第28期，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9年版，第3页。

② 即黑龙江——译者注。

③ 转引自C·沃尔特·杨：《中国人的拓殖与满洲的开发》（英文），载J·康德利夫编《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关系学会第三次会议纪录》，京都1929年版，第423页。

④ 《清史中的满洲边疆》，第103页；《二十世纪前半叶满洲的经济发展》，第11页。

⑤ 《中国人的拓殖与满洲的开发》，第423页。

人所使用。”^①利用把东北叫做“满洲”这样一个显然无关宏旨的习惯，让“满洲”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发展下去，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开路，最后，一九三二年，终于建立了日本的傀儡国家“满洲国”。实际上，作为一个地理上或地缘政治上的术语，“满洲”这个词显然没有什么精确的含意，因为一直被称为东三省的“满洲”，到一九三一年由于把热河包括在内了，就扩大为四省，拼凑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词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基本性质。通常，“满洲”这个词用于西方人的著作里。因此，实际上它的帝国主义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许多学者依然说“中国和满洲”，这正如说“中国和台湾”一样，是把假定作为论据的一种狡辩，容易造成误解，因而是错误的。清除这个词与帝国主义的所有连带关系，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困难的。因此，本书采取了“整顿名称”的办法，只是在加上引号的情况下才使用“满洲”这个词，否则，就以简单而明确的术语“东三省”来代替，或者在不大重要的地方就用“东北”，后两个都是直接译自汉语的名词。

在某些情况下，本世纪初期人们熟知的一些城镇甚至省份的名称，后来改名了。因此，还存在其他专用名称的问题，由于本书所涉及的许多官职和机构的名称与当时的地名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我们谈到地方时，就继续使用其旧称。例如，辽宁与河北省，就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间普遍使用的名称——奉天和直隶。这条原则的唯一例外是奉天省的首府，曾被称为奉天、承德和（自一九二九年起）沈阳，城名不一。事实上，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期间，官方称为奉天市，或奉天城^②。因此，为了避免省名与城名相混淆，本书将

① 《清史中的满洲边疆》，第60页。

② 鸳洲一：《奉天和辽阳》（日文），东京1940年版，处处皆然。

后者称为穆克敦，这是“满族”的旧称，而且，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为止，西方也一直这样称呼^①。

本世纪初，东北的人口稀疏地分布在三省各地：农民居于江河流域及比较容易进出的地区；土匪、伐木者、淘金者、采参者以及鹿茸商和毛皮商则疏疏落落地散布于山区或荒凉的穷乡僻壤^②。在这块边疆被卷入安定和发展的过程中，铁路之修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前喂猪的粮食可以运到市场，为出口而销售了。用于开发的技术、工人和资本迅即源源而来，主要地来自俄国和日本，当然，也来源于中国自身。英国修建的从北京到盛京^③的铁路，一九〇三年修到了新民屯。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日俄战争期间，筑路工程中断了。其后，一九〇七年，全线竣工了。俄国修筑的两千五百公里中东铁路，于一九〇三年竣工。它象个丁字形，横穿北部，并向南穿过了三省的心脏地区。竣工后不久，俄国的计划因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而不得不大加修改。在一九〇五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中，俄国租借地关东半岛和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线路的全部俄国权利，都转让给了日本。随后，在北京签定条约，中国政府正式同意了这种转让。

日本为了管理获得的这些权益，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新机构：南满铁路公司和关东都督府。南满铁路公司是个半官方的组织，一开始就有两亿日元的投资，是日本最大的公司，其日本名称常常简称为“满铁”。关东都督府，最初由一名都督管辖，负责租借地地区的行政，还掌管南满铁路线的警务。满铁远远不只是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它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就把那个确实参与了全部殖民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奉为楷模^④。满

① 中译本则以“奉天省”与“奉天城”相区别——译者。

② 欧文·拉铁摩尔：《满洲：冲突的摇篮》（英文），纽约1932年版，第67页。

③ 即后来的奉天城，现名沈阳——译者。

④ 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日文），东京1964年版，第1卷，第30页。

铁的重要活动，除了显然重点经营铁路之外，还管辖铁路附近早已形成的城镇。在那些城镇里，满铁效法俄国人的先例，实际上坚持独占行政管理权。这些地方的居民要向满铁交纳地方税，而满铁还经营象煤气、电气、自来水、学校、医院和旅馆那样的公共服务业，主要的日人商店、银行和工业公司则逐渐集中于日本租界之内。不管怎样，除了这些城镇，满铁还管辖其他土地。这些土地，不是一九〇五年直接从俄人手里强占的，就是有时在非常混乱和多变的情况下，在战争期间或之后，另外攫取的^①。这包括抚顺巨大的煤矿、鞍山（盛京附近另一个地方）的铁矿以及安东和营口的种种港口设施。简言之，满铁的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成了国中之国，大大地削弱和限制了历届中国政府在东北的主权。有位学者据此断定：“自一九〇五年起，满洲实际上逐渐地成为一份殖民财产，甚至可能比印度或爪哇还更为有用，……从许多方面说，满洲就象纸那样洁白，一个果断的经营家，凭借技术、组织和资本投放，可以非常轻易而迅速地将这份发展蓝图变成现实。”^②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表述公式似乎是太过分了。然而毋庸置疑，在东北，日本所掌握的财富、资源和军事潜力大概总是比任何中国当局都多得多。因此，不充分考虑日本的有关活动，就不能研究后者。然而，日本的控制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些中国当局常常远非傀儡。在本书中，这是变得越发清楚的要点。

在我们所着重论述的这段时期，即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东北三个省的经济对中国和日本来说，重要性都极大的增强了。对这种财富的争夺是决定二者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这里概略地叙述一下主要的经济发展。这个地区的

① C·沃尔特·杨：《日本在南满铁路地区的管辖权》（英文），巴尔的摩1931年版，第138—163页。

② 威廉·罗兹·墨菲：《通商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出了什么毛病？》，载《密执安中文研究论集》第7期，1970年版，第48页。